

第七章

結論

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東亞文化交流圈中，「儒家經典」、「思想人物」與「經典中的價值理念」三者之間關係密不可分，而且互為影響，交織成為東亞文化交流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本書之宗旨在於將儒家經典置於東亞文化交流的歷史脈絡中，析論「儒家經典」、「思想人物」與「價值理念」三者間之互動、轉化與融合之複雜關係。

從以上三個支點的任何一點切入，都可以通往其餘兩個支點。本書第一章曾提出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第一個問題意識：「自我」與「他者」的互動。從這個問題意識出發，本書第二章分析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自我」與「他者」之間四種張力的類型，指出在東亞儒者心目中，「自我」、「他者」、「文化認同」、「政治認同」四項因素中，「文化自我」最具重要性。他們認為：中、日、韓各國因為分享共同的文化核心價值理念如「仁」、「義」等，所以「自我」與「他者」的衝突可以消弭於無形之中，十八世紀朝鮮儒者丁茶山堅信日本因為有荻生徂徠等大儒，尊崇禮義，文化燦然，所以不會侵略朝鮮；十七世紀伊藤仁齋之子伊藤東涯也堅信孔孟絕無侵略日本之可能。從第二章的探討，我們可以發現：承載著文化價值理念的儒家經典，在東亞文化交流活動，轉化各國思想人物的生命，化解他

們在現實中所面對的各種衝突或緊張。在這個意義上，「經典」、「價值」與「人物」三位一體、不可分割。

但是，以上的說法到了東亞周邊國家的主體意識茁壯成熟以後，所謂「分享共同的儒家核心價值理念」，就會成為一個值得再斟酌的問題。本書第三章分析十八世紀東亞儒者的思想世界，雖然看到十八世紀中、日、韓儒者都通過反朱子學而反道德形上學，並且主張「本質」只能在「存在」中探索，「人倫日用」四字正是這個時代東亞儒者常用的關鍵字。十八世紀朝鮮儒者雖然仍慕華事大，但是他們的主體意識已經在茁壯中，而十八世紀日本儒者的日本主體意識更是早已成熟，荻生徂徠就直稱中國為「異國」。在主體意識成熟的背景之下，日本與朝鮮的儒者對所謂「分享共同的儒家核心價值」一事，就不免飽受「（源起於中國的）普世價值」與「（日韓的）地域特色」之間的拉扯，而必須有所轉化並調和於其間。

宏觀東亞文化交流史的發展，我們發現「普世價值」與「地域特性」之間的互動、轉化與融合，確實是一個最值得注意的現象。早在十六世紀朝鮮朱子學大師李滉（號退溪，1502-1571）就強調他的時代晚於朱熹（晦庵，1130-1200）數百載，讀朱子的書必須有所「損約」¹於其間；在十八世紀日本的五井蘭洲（純楨，子祥，藤九郎，1697-1762）²以及石田梅岩（1685-1744）³

¹ [韓]李滉：〈朱子書節要序〉，《陶山全書》（首爾：退溪學研究院，1988年，《退溪學叢書》），第3冊，卷59，頁259。

² [日]五井蘭洲：《雞肋篇》（大阪大學懷德堂文庫藏孤本），卷1。原

看來，生為日本人的德川儒者，竟不奉日本神道而崇仰外來的儒學，更是與叛國無異。在許多日韓思想家眼中，所謂「儒家普世價值」其實是源起於中國，隨著中華帝國的霸權之支配東亞世界，而成為東亞的「普世價值」，實不能掩其「文化霸權」之本質。因此，日韓儒者莫不致力於將源於中國山東半島的儒家價值理念加以轉化或拆解，以融入本土的、地域的文化或思想風土之中。

東亞儒家思想人物將經典中的核心價值理念加以拆解並轉化，最具有指標意義的就是中國經典習見的「中國」這個詞稱。本書第四章分析在中國經典中將「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合而為一的「中國」這個詞稱，在德川時代的日本經過日本儒者的挪移，去除其政治涵義而摘取其文化涵義，並將「中國」一詞轉用來指稱日本，可謂匠心獨運，別具慧眼。「中國」一詞在德川日本儒者手中經歷了「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以及「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發展，明確地告訴我們：東亞文化交流活動中的「人物」、「經典」、「價值」三者之中，以「人物」最為首出，居於最關鍵之地位。由於日韓儒者主體意識的照映，中國儒家經典及其價值理念（例如「中國」詞稱）取得新意義，並融入日韓各地的文化風土之中。《六祖壇經》云：「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確屬的論。只有經典的閱讀

書未見，此處係轉引自陶德民：《懷德堂朱子學の研究》（大阪：大阪大學出版會，1994年），頁271。

³ [日]石田梅岩：〈問云「遠鬼神」之事之段〉，《都鄙問答》，收入[日]柴田實編：《石田梅岩全集》（東京：石門心學會，1956年），頁45-47。

者才能在文化交流活動中出新解於陳編，使經典在異域取得新的生命與活力！

但是，儒者與經典之間並不是單線的支配關係，而且雙向的、辯證的循環關係。東亞儒家經典並不只是一套純知識性的「論述」(discourse)，而是一套身心性命之學。本書第一章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意識是「知識」與「權力」的互動，所以第六章分析東亞儒者讀經以「體知」為手段，而以達到「體現」(embodiment)為目的，內而轉化自己的身心狀態，外而可以完成治國平天下的事業。因此，東亞儒家的經典解釋必然與政治權力有其毛細孔般的互相滲透的關係。本書第六章指出東亞儒家經典詮釋與中、日、韓各國之權力結構之間既不可分割，又互為緊張，確屬既聯合又鬥爭之關係，但日韓儒者解讀來自中國戰國時代(463-222 B.C.)的《孟子》這部經典時，都努力於與他們所處的時空情境相調融。二十世紀法國哲學家呂克爾(Paul Ricoeur, 1913-2005)說：「所有詮釋學的目的，都是要征服存在於經典所屬的過去文化時代與詮釋者本身之間的疏遠和距離」，⁴就東亞文化交流脈絡中的儒家經典及其解釋觀之，確屬不刊之論。

⁴ Paul Ricoeur 著，林宏濤等譯：《詮釋的衝突》(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5年)，頁14。